



论武帝以前的汉匈关系

发布日期：2007-10-17 15:47:45 作者：高荣

(河西学院 历史系, 甘肃 张掖 734000)

摘要：武帝以前高祖、惠帝和高后时期，由于国势不振，汉朝试图通过和亲来“约束”匈奴侵扰。但是，匈奴一再背约的现实，迫使汉朝统治者对以往单纯依靠和亲以消弭匈奴入寇的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文景之世，在继续与匈奴和亲的同时，还采取了向西北边地移民和入粟于边以拜爵、除罪，建立官营牧马苑和鼓励民间养马等积极防御措施，使汉朝在西、北边塞的被动局面有所改变，从而为汉武帝武力反击匈奴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和亲；匈奴；“募民徙塞下”；入粟拜爵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7)04-0070-04

西汉二百多年间，其对匈奴的政策曾有过较大调整。汉武帝以前，基本上以和亲为主。然而，学术界对汉初与匈奴和亲的原因、内容及其实质等问题，仍存在很大分歧。有学者认为，汉初与匈奴和亲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经济凋敝、政局不稳，而在于白登之围的失败和缺乏有效的抗击匈奴的战略战术^[1]（156-161）；汉高祖与匈奴和亲，根本不是为了发展经济，也不可能带来汉初社会的和平与安宁^[2]。结合汉匈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来看，汉初与匈奴和亲，实际上是在汉弱而匈奴强的形势下，被迫实行的一种妥协政策，对汉匈双方都是有利的。

匈奴的迅速崛起始于冒顿单于。史称“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3]（2890）。从而形成了“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相抗之局”^[4]（63）。冒顿是头曼单于长子，曾被立为太子。后来，头曼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其喜爱之阏氏所生的少子，乃送冒顿到月氏为质子。随后又派兵“急击月氏”，企图假月氏之手以杀冒顿。冒顿则在月氏下手之前“盗其善马，骑之亡归”。此举令头曼单于大为赏识，遂使冒顿统帅万骑。冒顿对其部属严格训练，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终于在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杀父自立。“是时汉方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冒顿乘此有利时机，重新占领了被蒙恬夺去的“河南地”，控制了大漠南北和河西、河湟及广大的西域。据《史记·匈奴列传》载：

（冒顿单于）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而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方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至冒顿而匈奴最彊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3]（2889-2890）《后汉书·西羌传》称：“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5]（2876）

匈奴的崛起，对刚刚建立的汉王朝构成很大威胁。汉高祖六年（前201年）九月，匈奴大兵围攻马邑，韩王信投降匈奴，并与匈奴联兵南下，攻晋阳（今山西太原）。次年，刘邦亲率大军击匈奴，反被匈奴包围于平城白登山达七日之久。后用陈平之计，厚贿匈奴阏氏，始得解围脱险。《史记·匈奴列传》载，时汉军32万，多步兵；匈奴精骑40万，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骊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驃马。汉匈双方兵力之强弱，于此可见一斑。此后，时有汉将投降匈奴者，匈奴因之气势更盛，“常往来侵盗代地”^[3]（2894-2985）。

就在匈奴不断南下，“数苦北边”的危急形势下，汉朝国内却因秦末以来连绵不断的战争破坏，社会经济萧条残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3]（1417）。百姓创痍未复，哭泣之声未绝。尽快安定民生，恢复经济是汉初的当务之急。汉高祖根据陆贾等人的建议，对内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外则从娄敬之计，将汉家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为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试图通过和亲来缓和汉匈关系，进而消弭匈奴对汉朝边郡的

擄掠。

及至惠帝、高后时，匈奴冒顿单于更加骄横，他在一封给高后的信中出言不逊，声称“孤愤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愤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这使汉朝君臣上下大为震怒，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樊哙甚至厉言：“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但就当时形势而言，樊哙所云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自欺欺人的狂妄之言，故被季布斥为“妄言”、“面谩”。权衡利弊，高后最终采用季布之言，除了以“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来安慰自己外，又遣谒者报书云：“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汗。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6〕（3755）。

不难看出，高后是以非常低调的言辞委婉地拒绝了冒顿的要求，实际上是汉朝君臣在双方力量悬殊的形势下，仔细权衡利弊作出的虽然痛苦但却是明智的选择。于是，汉匈双方再续和亲。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冒顿单于在给汉文帝的信中，表达了“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的愿望。汉朝也认为：“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和亲甚便。”〔3〕（2896）此后，历文景之世，直到汉武帝初年，汉朝都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

汉与匈奴均有和亲意愿，但就汉朝而言，却是在匈奴强而汉弱的形势下无可奈何的选择。汉文帝时中行说对汉使的一番话，就很可能说明问题。他说：“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缿絮米糲，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为言乎！且所给各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熟，以骑驰蹂而稼穡耳。”〔3〕（2901）汉朝在双方和亲中所处的被动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和亲之策未必可取，“然百姓新困于兵，又内多反侧者，固不得不如此”〔4〕（65）。就总体而言，和亲政策的实行，对于缓和匈奴南下骚扰，保证边境地区安宁，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然而，和亲政策是汉匈双方力量不平衡的产物，它对双方的约束也是不平衡的，更不可能如娄敬所愿，从根本上消除匈奴威胁。双方虽有“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3〕（293）之约，但“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而且“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3〕（2861）。对此，汉人也多有议论，或云“匈奴数和亲，而常先犯约，贪侵盗驱，长诈之国也。反复无信，百约百叛”〔7〕（514）；或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7〕（2）。以致汉朝“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6〕（2240）。

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匈奴14万骑入朝那、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杀北地都尉，擄掠大量人口畜产，甚至烧毁了回中宫，直接威胁长安。汉朝除发车千乘、调10万骑驻屯长安附近以为备，还派五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匈奴此次南下，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朝方面则仅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于是“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3〕（2901）。

此后，双方“复言和亲事”。后元二年（前162年），汉文帝在给匈奴老上单于的信中再次重申旧约：“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又布告天下：“和亲已定……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3〕（2902）后元六年（前158年），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烽火通长安，三将军屯边，又三将军屯京师”〔6〕（1392）。匈奴的不断侵扰，使汉朝一些大臣对和亲政策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著名政论家贾谊就曾上书汉文帝，坚决反对与匈奴和亲。他认为：“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缿以奉之”，实际上就是向匈奴进贡，是“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是臣下之礼也”，是“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故谓之“倒悬”！以汉朝之大而“困于一县之众”的匈奴，“甚为执事者羞之”。为此，他自请“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对匈奴施以“三表五饵”之计，最终“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答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8〕（30-33）。贾谊此论，不过是书生出于激愤的空谈和脱离实际、妄自尊大的偏见，但匈奴“侵盗不已”却是事实。前元十四年（前166年），鉴于匈奴大掠北地的状况，汉文帝也曾“亲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吏卒”，甚至“自欲征匈奴”。然而，由于汉朝内部诸侯王强大难制，威胁中央，所谓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加以民生困苦，国力不济，又恶烦苦百姓，遂不发兵深入。数月后，匈奴远去，汉亦罢兵。但汉文帝在同匈奴和亲的同时，也在积极采取措施，“坚边设候”，讲习战阵，甚至“亲自劳军，勒兵申教令欲自将击匈奴”〔3〕（428）。

继贾谊之后，太子家令晁错又上书言兵事。他认为自汉兴以来，匈奴屡次寇边，而对西北边陲的陇西为害最烈。“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殴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而匈奴“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他从地形、士卒和器用等方面分析了汉匈双方的优劣得失：匈奴之利在于战马、骑射和能耐饥渴，汉朝之利在于轻车突骑、劲弩长戟、坚甲利刃和材官之士下马地斗、矢道同的。相比之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因此，他建议，一方面利用归附汉朝而饮食长技与匈奴同的降胡、义渠等部，与汉朝的轻车材官之士互为表里以制匈奴，实现以蛮夷攻蛮夷的目的；另一方面调整御边策略，改远方之卒守塞而为常居者卫边。徙民塞下，使久安其处，寓保全家小与守塞卫边于一体，变被动为主动。他认为长期以来，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旷野……往来转徙，时至时去，专伺汉朝守塞吏卒力量薄弱之时袭击边地，汉朝虽有戍卒守边备塞，但因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匈奴骑兵南下行动迅速，进退自如，汉兵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困而民不安矣。因此，他建议，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高城深堑，完善防御。其具体做法是：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

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此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在此基础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晁错还建议鼓励民间养马，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此即马复令。这个建议，的确不失为审时度势、扬长避短的御敌良策。

汉文帝乃从晁错之言，募民徙塞下、令民入粟边、推行马复令^[6]（2278-2286，1133-1134）。这些措施的实行，大大增强了汉朝边塞的防御能力。关于汉文帝朝对匈奴政策的调整，诚如班固所云：

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材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6]

（3831）匈奴的一再背约，宣告了汉朝修文而和亲政策的失败，汉文帝遂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讲习战陈。但因国力不济，不免喟然叹息！汉景帝时，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翁主如故约。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汉武帝即位后，继续推行汉初以来的和亲政策，“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3]（2904）。但是，在这种表面的和平背后，正孕育着更大规模的武力冲突。正如桑弘羊所云：“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先帝（即汉武帝）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故广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7]（479）实际上，不论是“以武折”，还是“以德怀”，都是以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为基础的。

参考文献：

- [1] 武沐.匈奴史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 [2] 张菁.再论汉初的“和亲”[J].南京师大学报,1997(4).
-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 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5]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6]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7]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8] 卢文弨校.贾谊新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谢海涛】